趣味即文化：殷企平文学批评思想研究

Taste as Culture: Yin Qiping's Thoughts on Literary Criticism

孙勇彬（**Sun Yongbin**）

内容摘要：20世纪以来，文学理论历经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及文化研究等多重转向，文学批评日益理论化、技术化和学院化，与普通读者渐行渐远。面对这一困境，殷企平立足英国文化批评传统研究，系统阐释“趣味即文化”的理论逻辑，重建文学批评的公共性维度。他突破将“趣味”单纯意识形态化的阐释路径，恢复其作为文化感受力与价值判断能力的理论意义；在继承阿诺德文化思想的基础上，将文学批评重新连接公共文化与普通读者，并呼应英国批评传统中的“普遍人性”理念；同时，通过对伊格尔顿理论的批判性吸收，将“趣味”进一步发展为具有公共责任意识的文化伦理实践。由此，殷企平形成了具有原创性的“趣味伦理”思想，为当代文学批评重建公共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殷企平；趣味即文化；趣味伦理；普通读者；公共性

作者简介：孙勇彬，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和加拿大文学。

Title: Taste as Culture: Yin Qiping's Thoughts on Literary Criticism

Abstract: The twentieth century witnessed a cascade of paradigm shifts in literary theory, encompassing Formalism, New Criticism, Structuralism, Post-structural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etc. While these developments substantially expanded th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horizons of literary criticism, creating a growing distance between academic criticism and general readers. To address this dilemma, Yin Qiping engages the British cultural critical tradition to elaborate the cohere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aste as culture," striving to reinstate the public orienta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Refuting the simplistic framing of taste as nothing more than an ideological category, he restores taste's standing as authentic cultural sentiment and evaluative judgment. Extending Matthew Arnold's cultural thought, Yin re-links literary criticism to public culture and common readers, aligning his work with the British critical tradition's preoccupation with universal human commonality. His critical interrogation of Terry Eagleton's theories further

evolves taste into a cultural-ethical praxis rooted in civic duty. By synthesizing these arguments, Yin advances an innovative "ethics of taste," furnishing crucial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to retrieve its communal vitality.

Keywords: Yin Qiping; taste as culture; ethics of taste; common readers; communality

Author: Sun Yongbin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 is English literature and Canadian literature (Email: syongbin@nufe.edu.cn).

20 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不断推动研究重心的迁移。从形式主义与新批评对文本内部结构的关注，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及文化研究对语言、权力与意识形态的持续介入，文学批评逐渐呈现出高度理论化与专业化的倾向。在这一过程中，批评实践越来越依赖复杂的理论术语与学术体制，而与普通读者、公共文化之间的关联则不断弱化。如殷企平所说，"在过去四五十年中，始终泛滥着轻视乃至敌视普通读者的倾向，并且汇成了国际潮流，致使学府和研究机构的高墙内外，西方文论曲高和寡"（"普通读者" 45）。英国文学理论家兼批评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也曾说过，"当文学研究被纳入制度化与专业化轨道后，文学批评逐渐由一种面向公共文化的精神实践，转变为学院内部的知识生产，其与社会精神生活之间原本鲜活的联系也趋于松动"（Eagleton 291）。在此背景下，如何重新思考文学批评的公共意义，并重建文学、批评与普通读者之间的联系，成为当代文学理论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

依托上述问题意识，殷企平有关"趣味即文化"的研究具备别具一格的理论阐释意义。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文化观念流变中的英国文学典籍研究"成果总序中，他勾勒了文化观念主要内涵的十个关键词，其中"审美趣味"是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还涵盖"转型焦虑""愿景描述""共同体形塑""秩序诉求""心智培育""文学语言的创造""民族良心""道德伦理传统"和"工作/生活方式"。"它们彼此之间都有着内在的联系，甚至密不可分"（曹山柯等xxii）。通过对阿诺德文化思想以及伊格尔顿批评实践的深入阐释，殷企平突破了长期以来将"趣味"简单化为意识形态表征的解释路径，使其重新获得文化价值与精神维度。在他看来，"趣味"并非个人化的审美偏好，而是一种关涉文化品质与价值辨识的能力：它既意味着对"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与言论"（Arnold, *Culture and Anarchy* 70）的识别与追求，也承担着抵抗庸俗化与机械化、维护社会精神秩序的重要功能。如英国学者加里·戴（Gary Day）所说，自19世纪以来，文学批评

的重要使命之一便是“预防社会失序”（1）。而殷企平在分析伊格尔顿理论风格时，则进一步揭示了“趣味”背后所蕴含的公共精神维度，指出其核心在于一种兼具辩证鉴别力与文化责任意识的精神实践（“走向公共精神”76）。

更值得注意的是，殷企平对“趣味”的重建并未重新滑向传统精英主义立场。相反，在继承阿诺德文化理想的同时，他始终强调文学批评与公共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试图重新确立普通读者在文学生活中的主体位置。这一理论取向，与英国文学批评传统中由塞缪尔•约翰生（Samuel Johnson）所开启的公共批评精神形成了呼应，即文学价值最终需要回到“普遍人性”与共同阅读经验之中加以确认。由此，“趣味”在殷企平那里已不再局限于狭义的审美判断，而逐渐发展为一种兼具文化辨识、精神教养与公共责任的伦理能力。通过文学与文学批评帮助普通读者重新获得价值判断能力、精神辨识能力与文化成长能力，殷企平最终形成了一种具有鲜明原创性的“趣味伦理”思想，使文学批评重新回到公共文化建构与精神生活重塑的层面。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伦理阐述呼应了聂珍钊的伦理批评思想，两者相映成趣，相得益彰。总之，“趣味伦理”不仅构成殷企平文学批评思想的核心，也为当代文学批评如何走出学院化困境、重建公共性提供了重要理论启示。

一、恢复“趣味”的理论正当性：超越意识形态化阐释

殷企平文学批评思想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他通过对英国文化批评传统的梳理，尤其是对阿诺德文化思想的阐释，使长期被边缘化的“趣味”概念重新获得理论正当性，并恢复其在文学批评中的核心地位。

在 20 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进程中，文学研究逐渐由审美经验与价值判断转向对权力结构、意识形态与文化机制的分析。在这一理论语境下，由于“趣味”涉及价值区分与文化判断，它往往被视为带有精英主义色彩的人文主义遗产，甚至被理解为某种文化权威的意识形态表征。以伊格尔顿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便倾向于将阿诺德式文化观纳入意识形态批判框架。在《文学理论导论》（*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1983）中，伊格尔顿认为，阿诺德的文学批评实质上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与文化等级的功能，其使命不过是“把中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一药剂裹上文学糖衣”（26）。然而，殷企平并未止步于这种将“趣味”完全意识形态化的解释逻辑，而是重新审视阿诺德文化思想的现实关怀与精神维度。在《“文化辩护书”：19 世纪英国文化批评》及“趣味即文化：阿诺德对文学批评的贡献”等研究中，他指出，若仅从阶级统治或文化霸权的角度理解阿诺德，便难以解释其对英国中产阶级“非利士主义”（Philistinism）的持续批判，也无法充分理解其对于工业文明扩张所引发的精神贫困、功利主义蔓延以及社会失序问题的深层焦虑。如殷企平所强调的，阿诺德真正关注的，并非文化领导权的阶级争夺，而是“如何

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以及如何实现新旧社会之间的完美过渡”（《“文化辩护书”》91）。

殷企平的这一重新定位，使阿诺德的文化思想摆脱了被单纯视作意识形态治理工具的阐释框架，重新回归文化教养与精神建构的问题域。事实上，阿诺德对“非利士主义”的批判本身即具有鲜明的趣味维度。如琼斯（Tod E. Jones）依据《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 2008）所指出的，非利士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趣味的平庸与粗鄙”（2-3）；而阿诺德在《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 1962）中亦将“非利士人”描述为“单调乏味、墨守成规、与光明为敌的人”（112）。这些论述表明，在阿诺德那里，“趣味”并非私人化的审美偏好，而始终与社会精神状态及文化品质密切相关。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殷企平重新恢复了“趣味”的理论价值。他并不否认意识形态分析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但同时强调，若将文学批评完全化约为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机制的揭示，其结果往往是价值判断能力的削弱，以及文学公共意义的消隐。文学批评之所以不可替代，恰恰在于其承担着辨识文化品质、维护精神理想并引导价值秩序的重要功能。因此，在殷企平对阿诺德思想的阐释中，“趣味”已不再意味着个人化的审美偏爱，而是一种文化感受力与价值辨识能力。它既意味着对“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与言论”的识别与追求，也意味着对庸俗化、机械化以及精神失衡倾向的文化抵抗。如高晓玲所说，“相较于同时代思想家更关注制度与功利层面的社会进步，阿诺德更担忧审美庸俗化与道德失序，并主张借助‘最优秀的思想与言论’塑造‘最好的自我’，实现大众精神生活的提升”（54）。可以说，殷企平的重要理论贡献，正在于他通过对阿诺德“趣味”观的创造性阐释，使这一长期被视为精英主义遗留物的概念重新获得文化意义与精神维度，并重新确立其在文学价值判断与公共文化建构中的理论功能。

二、阐释英国文学批评传统：约翰生与“普通读者”的回归

殷企平对“趣味”的重新阐释，并未停留于概念层面的理论修复，而是进一步扩展为对英国文学批评传统的重新理解，其核心在于重新激活文学批评的公共维度，并恢复普通读者在文学价值生成过程中的重要位置。

在研究 19 世纪英国文化批评时，殷企平强调，文学批评的意义并非止于揭示文本的审美形式，而是通过对文学所承载的文化观念进行辨析，反思现代文明中的价值失衡，并探寻共同体与精神生活的可能重建。[1] 阿诺德曾警示：“对机械工具的信仰乃是纠缠我们的一大危险”（《文化与无政府状态》12）。殷企平进一步指出，阿诺德之所以推崇“文化”，根本原因在于其敏

1　参见 张琰、殷企平：“‘普通读者’与外国文学研究：殷企平教授访谈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3（2022）：14-23。

锐意识到社会转型带来的深层危机："新兴的工业文明仰仗的是机械力量和物质力量，缺失了精神的力量"（《"文化辩护书"》6）。这一现实判断，也构成了殷企平"趣味即文化"命题的重要理论起点。在他看来，文学批评本质上是一种面向公共生活的文化实践，其意义不仅在于解释文学，更在于维系社会精神秩序。基于此，殷企平对阿诺德文化思想的阐释，实际上完成了对"趣味"概念的重要转向。阿诺德所谓的"文化"，并非狭义意义上的审美规范或阶层品位，而是一种旨在协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重建社会整体价值秩序的文化理想，其核心在于推动文化理想的传播与内化。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前言中写道："全文的意图是大力推荐文化，以帮助我们走出目前的困境。在与我们密切相关的所有问题上，世界上有过什么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文化都要了解，并通过学习最优秀知识的手段去追求全面的完美"（185）。殷企平赞同这一观点，并强调"在阿诺德心目中，文学批评就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其核心部分。更需指出的是，无论是阿诺德的文化，还是他的文学批评，都是以趣味为轴心的"（"趣味即文化"45-46）。殷企平还以阿诺德的诗作《伦敦西部》（"West London," 1867）中一位身处社会底层的流浪女子为例，指出即便是身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也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精英"，并能够"指引我们向往胜过这个时代的美好时光"（"West London" 567）。由此可见，"趣味"不应被理解为区分阶层高下的审美趣向，而更应被视为一种关涉文化教养、精神辨识与公共价值的能力。

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殷企平对英国文学批评传统进行了更具纵深感的重新理解，并使其与塞缪尔·约翰生以来强调普通读者经验的公共批评传统形成呼应。尽管约翰生并未建构完整的趣味理论体系，但其批评实践始终建立在"普遍人性"（general nature）与公共阅读经验之上。在《莎士比亚序言》（*Preface to Shakespeare*, 1765）中，他明确指出："唯有对普遍人性的真实呈现，才能长久赢得公众的喜爱"（61）。在这一判断中，文学价值既需要经受时间检验，也必须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由此，"趣味"被赋予了一种超越私人偏好的公共属性。更重要的是，约翰生始终强调判断能力的"可培养性"。他在《漫游者》（*The Rambler*, 1751）中多次批评青年读者未经辨析便接受权威意见，满足于"二手知识"，而缺乏通过阅读、比较与思考形成独立判断的能力。[1]因此，在约翰生那里，文学判断既非少数精英的特权，也不是瞬时感受的任意表达，而是一种能够通过阅读实践不断养成的文化能力。

虽然殷企平很少直接讨论约翰生，但其关于"趣味"的重释，在理论旨趣上与这一传统形成了深刻呼应。他反复强调，文学批评不应沦为学院内部封闭化、术语化的知识生产，而应重新回到普通读者的精神生活之中。[2]

1　参见 W. J. Bate and Albrecht B. Strauss, eds., *The Yal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Samuel Johnson* Vol. 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2　参见 殷企平："普通读者"，《外国文学》6（2019）：44-54。

文学批评的价值，并不在于制造越来越复杂的理论体系，而在于帮助读者提升对文化品质与精神价值的辨识能力。对此，弗兰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曾感叹：“能够指望普通读者听懂理论教授们高谈阔论的时代早已过去了”（8）。同样，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也批评文学批评逐渐远离公共领域，退守大学象牙塔：“作为文学的一种变体，它一味迎合各种时髦的意识形态，热衷于拉山头，占地盘，充斥着专业话语”（52）。这些反思恰恰说明，当文学批评脱离普通读者时，其公共功能也随之弱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殷企平重新赋予“趣味”以公共文化属性：它既是一种审美能力，更是一种精神判断能力与文化成长能力。更为关键的是，约翰生并未将文学批评的权威垄断于专业批评家，而是将普通读者置于文学意义生成的基础位置。在他看来，批评家的职责并非取代公众判断，而是提炼与深化公共阅读经验。因此，文学价值最终并不封闭于学院知识体系内部，而是在阅读共同体之中持续生成。如约翰生所说，“我乐于与普通读者保持一致，因为诗歌荣誉的一切诉求，终究必须由未受文学偏见污染的读者常识来裁定，而非由繁复的机巧分析与学究式教条决定”（*Life of Gray* 449）。由此，约翰生的趣味观呈现出鲜明的反精英主义倾向，其核心在于将文学理解为一种公共文化实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殷企平并未简单回归传统文化权威，而是在继承阿诺德文化理想的同时，将“普通读者”重新带回文学批评视野，并推动“趣味”由审美判断进一步转向文化伦理。“普通读者既可以是现实存在者，又可以是理想读者，但首先是现实存在者，他们是广大的受众”（张琰 殷企平 17）。然而，在消费主义蔓延、娱乐工业强化与媒介碎片化不断侵蚀精神生活的现实语境中，普通读者的文化判断力与精神辨识力持续弱化。“在过去四五十年中，曾经备受尊重的普通读者渐渐消失了，不在批评家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了”（“普通读者”46）。面对这一处境，殷企平强调，文学批评的重要任务不仅是解释文本，更在于帮助普通读者形成价值识别能力与精神成长能力。他以当代美国作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为例，指出其作品之所以至今仍被广泛阅读，正在于其具有超越时代的审美维度。“熟悉《兔子，跑吧》的读者，首先会被它的文字魅力所吸引，被它那跌宕起伏的情节、鲜活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喻象所吸引，被它幽默的语言风格所打动，并因此而产生愉悦”（“普通读者”52）。而这种审美愉悦的试金石，恰恰是普通读者。再如，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老古玩店》（*The Old Curiosity Shop*, 1841）即是典型例证：在小说接近完稿时，他每天都会收到大量读者来信，其中“大都出自长满老茧、晒得乌黑的劳动人民之手”（“普通读者” 53）。因此，在殷企平的理论框架中，“趣味”已不再只是审美趣向，而逐渐成为一种融合文化感受、价值判断与公共责任意识的综合能力；“趣味即文化”也不再只是对阿诺德思想的概括，而是对文学批评如何重新连接普通读者、重建公共

性的深层思考。

三、对伊格尔顿的批判性继承：从意识形态批评到“趣味伦理”的理论推进

殷企平文学批评思想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他并未停留于对西方理论的接受、转述或简单批判，而是在充分吸收其问题意识的基础上完成理论重构。其中，对伊格尔顿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的重新阐释，尤为体现出其将“趣味”重新置回文学批评中心的理论自觉与创造性推进。

长期以来，伊格尔顿通常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代表，其研究主要围绕文学与权力机制、文化生产及意识形态运作展开。如殷企平所说，伊格尔顿的理论声誉几乎始终与“意识形态”相联系，其代表性著作亦多直接以此命名，如《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美学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导论》等（“走向公共精神”72）。在这一解释框架下，“趣味”往往被理解为受社会结构制约的文化表征，其相对独立的价值判断功能不断被削弱。然而，殷企平并未接受这种单一化理解，而是敏锐地发现，伊格尔顿理论内部始终存在一个长期被忽视的“趣味维度”。在“走向公共精神：伊格尔顿的趣味观”中，他特别指出，尽管伊格尔顿“从未系统地就趣味而论趣味”，但“趣味不仅几十次地出现在《美学意识形态》中，而且不断出现在其大多数著作中”（72）。在殷企平看来，伊格尔顿理论写作之所以具有鲜明风格，并不仅仅因为其意识形态分析的锋利性，更在于其中始终贯穿着一种稳定的价值辨析能力与文化判断意识。殷企平还提出，伊格尔顿理论实践的深层逻辑，可概括为一种“甄别的辩证法”（72）。无论是在文学形式、文化立场还是价值观念问题上，伊格尔顿始终拒绝机械化的二元对立，而是在复杂张力中维持判断的开放性。例如，在处理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时，他既反对将文学简单理解为“以某种艺术形式出现的意识形态”，也拒绝将文学浪漫化为一种超越时代意识形态限制的纯粹真理，而是强调“文学作品是意识形态结构的一部分”，同时，“又通过自己的艺术改造了意识形态结构”（*Marxism* 17-19）。在殷企平看来，这种持续的价值辨析本身已超越单纯的方法论操作，而构成一种隐含的“趣味实践”——即通过比较、甄别与反思形成文化判断能力。

在此基础上，殷企平进一步将伊格尔顿的“趣味维度”与其公共理论结构加以关联，指出其思想始终与“公共领域”“精神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以及“普遍共同的感觉”等概念紧密相连。殷企平认为伊格尔顿“是要在趣味和公共精神之间架一座桥梁”（“走向公共精神”76）。例如，在《美学意识形态》中，伊格尔顿认为“审美趣味的全部意义在于，它作为精神共同体的模式，是不可能强加于人的”（63）。同时，相较于道德训诫或意识形态灌输，“趣味、情感和舆论更雄辩地证明，让人产生共鸣的是某种普遍共同的感觉”（32）。可见，伊格尔顿趣味观的核心特征，正在于其不可强制性

与公共可感性。对殷企平而言，这进一步表明，伊格尔顿事实上并未取消“趣味”，而是试图将其重新纳入公共文化结构之中。

更具理论推进意义的是，殷企平还揭示出，尽管伊格尔顿长期批判阿诺德式文化理想，其理论内部却始终保留着对“何为更好的文学”以及“何为更好的文化生活”的持续追问。换言之，意识形态批评并未真正取消价值判断，而只是改变了价值判断的表达方式。如殷企平所说，伊格尔顿最终仍指向一种具有公共维度的“道德趣味”，其批评实践在深层上始终关涉共同文化、公共精神与精神共同体的建构（“走向公共精神”76-80）。然而，殷企平并未止步于揭示伊格尔顿理论中的“趣味因素”，而是进一步反思其内在限度。由于始终受意识形态批评范式制约，伊格尔顿虽然无法放弃价值判断，却始终难以充分论证价值判断本身的理论正当性。这使其理论呈现出一种持续存在的张力——一方面需要“趣味”维系文化判断，另一方面又始终警惕其可能导向规范化与文化权威。

对此，殷企平尝试在传统人文主义与激进意识形态批评之间寻求新的理论平衡。他既反对将“趣味”重新塑造为少数文化精英的专属权力，也不同意以权力分析彻底取消文学价值判断。在他看来，“文学之所以重要，文学批评之所以重要，多半是因为文学阅读能帮助人类甄别价值，从事价值判断”（张琰 殷企平 19）。一旦文学批评失去“趣味”，其辨识文学价值与精神品质的能力便难以维系；但若重新退回审美等级秩序，又会切断文学与公共文化之间的联系。因此，“趣味”应被重新理解为一种兼具文化判断与公共责任的能力：它既涉及文学价值辨析，也关涉普通读者的精神成长；既体现审美能力，也体现文化教养与公共参与意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殷企平强调将普通读者纳入共同体研究，并赞同将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置于由阿诺德、利维斯、艾略特、克莫德和特里林等人构成的文化传统中加以审视。他提出，中国学界既应借鉴这一传统在阅读共同体建构方面的经验，又需要进一步超越其历史局限：“我们要构建的阅读共同体，不能局限于利维斯所塑造的学生读者团体，也不能局限于特里林所培养的中产阶级读者，而是服务于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阅读共同体”（张琰 殷企平 19）。

由此，殷企平逐渐将伊格尔顿理论中的“意识形态趣味”推进为一种更具公共性与伦理维度的“文化伦理趣味”。这一理论推进意味着，文学批评不再仅仅服务于权力揭示或理论生产，而重新承担起文化引导与精神建构的功能。在消费主义扩张、媒介碎片化与公共精神不断弱化的现实语境中，文学批评的重要意义，正在于帮助读者重新形成价值辨识能力与精神判断能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殷企平不仅是伊格尔顿理论和批评实践的研究者与阐释者，更是其理论张力的推进者与重构者，使“趣味”重新成为连接文学价值、公共文化与伦理责任的重要枢纽。

四、“趣味伦理”的提出：殷企平文学批评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如果说“趣味即文化”构成了殷企平文学批评思想的理论核心，那么由此延展出的“趣味伦理”则意味着其批评观念完成了由概念阐释向价值建构的深化，并构成其在当代文学批评语境中较具原创性的理论贡献之一。需要说明的是，“趣味伦理”并非殷企平直接命名的既定术语，而是其围绕阿诺德文化思想、伊格尔顿趣味观以及英国文学批评公共传统展开持续研究后逐步形成的理论旨归，也是其在讲座和教学过程中反复强调的观点。它不仅体现出对英国文化批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也回应了当代文学批评公共性衰退与价值失衡的现实困境，从而形成一种兼具文化关怀与伦理维度的文学批评立场。

在重新阐释阿诺德文化思想时，殷企平并未将其简单归结为传统人文主义的保守倾向，而是将其置于 19 世纪英国社会转型与现代发展的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他指出，阿诺德提出“文化”概念，根本目的并非维护一种封闭的古典趣味，而是在工业化、世俗化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通过文学和文化教育回应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精神危机与价值失序问题。阿诺德所谓的“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与言论”，在殷企平看来，也并非经典知识的机械积累，而是一种借助文学与文化实践重建精神秩序与价值结构的努力。由此，殷企平意识到，当代文学批评实际上陷入了一种双重困境：如果“趣味”仅被理解为审美能力，它容易滑向精英主义的文化逻辑；而如果完全依循激进意识形态批评而取消价值判断，文学批评则可能陷入相对主义与意义消解之中。因此，如何在维护价值判断必要性的同时避免文化排斥，便成为其理论推进的关键问题。殷企平还指出，伊格尔顿就把阿诺德看成约瑟夫·艾迪生一类的“精英主义”文人兼批评家，并认为他们的文化就是帮助巩固英国统治集团的东西，而批评家则是这一历史任务的承担者。[1]

与此同时，殷企平对伊格尔顿趣味观的发掘，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思考。他认为，尽管伊格尔顿长期以意识形态批评著称，但其理论内部始终保留着对于“公共精神”“共同文化”以及精神共同体的持续关注。然而，在殷企平看来，仅仅强调公共性仍不足以真正回应当代文化困境：面对消费主义扩张、娱乐工业强化与数字媒介重塑文化经验的现实语境，普通读者越来越容易陷入精神经验碎片化、审美能力弱化以及价值判断失衡的状态。在这种背景下，文学批评的重要意义便不应仅停留于文本阐释或权力揭示，而应重新承担精神引导与文化建构的责任。[2]

也正是在这一理论张力中，殷企平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明确伦理维度的

1　参见 殷企平：“趣味即文化：阿诺德对文学批评的贡献”，《外国文学研究》5（2021）：43-54。

2　参见 殷企平：《殷企平学术研究文集》，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5年，第478-479页。

“趣味”观。在他那里，“趣味”不再意味着少数人借助高雅文化确立文化优越性，也并非学院知识通过专业术语建构新的话语壁垒，而是一种面向公共生活的文化能力。它强调的不是审美等级，而是精神教养；不是文化区隔，而是价值引导；不是学院内部的知识封闭，而是文学重新进入公共生活的可能性。换言之，“趣味”的真正意义，在于帮助普通读者形成精神辨识能力、文化判断能力与价值选择能力，从而重新建立人与文学、人与文化之间的深层联系。就此而言，殷企平关于“趣味伦理”的思考，也与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关于文学根本功能的论述形成呼应。聂珍钊指出，“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伦理的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伦理的艺术。文学的任务就是描写这种伦理秩序的变化及其所引发的问题和导致的结果，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经验和教诲”（1）。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核心，就是挖掘文学作品中人物和事件之中蕴藏的伦理价值和道德倾向。他还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文学作品对于社会和读者的道德警示和教诲作用”（9）。就此而言，殷企平所倡导的“趣味伦理”，同样超越了狭义审美范畴，不再仅仅关注审美快感或文本技艺，而是强调文学如何通过价值判断、文化教养与精神辨识重新参与人的成长过程，并帮助普通读者重建与公共文化之间的联系。

因此，“趣味伦理”实际上体现了殷企平对当代文学批评功能的一次重新界定。他既反对传统精英主义式的文化垄断，也反对彻底取消价值判断的虚无主义倾向；既坚持文学批评应当具有文化判断功能，又强调普通读者参与公共文化的权利；既重视经典传统所承载的精神资源，也关注现实社会中的公共文化生活。从这一意义上说，殷企平的理论贡献，并不仅在于重新解释阿诺德或修正伊格尔顿，而在于他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学批评伦理结构，使文学批评重新回到精神成长、文化建构与公共生活重塑的问题意识之中。

与此同时，殷企平对普通读者与公共文化的持续关注，也与张隆溪关于文学跨文化交流与人文共同性的思考形成互证。张隆溪认为，“文化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不相通或完全不可译的。文化不相通的全盘性概略论述，往往是言过其实的夸张说法”（15），过度强调差异则容易遮蔽文学沟通与公共理解的可能性。殷企平所倡导的“趣味伦理”，某种程度上正体现出这种开放的人文立场：文学批评的意义，不在于制造新的文化区隔，而在于通过价值辨识与精神引导，帮助普通读者重新进入共同文化生活，并恢复人与文学、人与公共精神世界之间的联系。

因此，“趣味伦理”不仅可以被视为对阿诺德文化理想的现代转化，也意味着殷企平对当代文学批评公共性的重新确认。它最终所回应的是现代性语境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在精神碎片化与文化消费化不断加剧的时代，文学批评如何重新参与人的文化生活建构，并恢复公共精神秩序的可能性？

总体来看，殷企平围绕“趣味即文化”这一核心命题，通过对阿诺德文化思想、伊格尔顿批评理论以及英国文学批评传统的重新阐释，推动了“趣味”概念在当代文学理论中的重新定位。他并未停留于对西方理论资源的简单引介，而是在回应文学批评公共性危机的现实语境中，重新确认了“趣味”作为文化感受力、价值辨识力与精神判断力的理论意义。一方面，殷企平突破了 20 世纪以来以意识形态分析与权力批判为中心的单一阐释路径，使文学批评重新获得文化评价与精神引导的合法空间；另一方面，他在继承英国文学批评公共传统的基础上，重新激活普通读者在文学价值生成过程中的重要位置，使文学批评由学院内部的专业话语重新面向公共文化生活。尤为重要的是，殷企平在阿诺德文化理想与伊格尔顿公共精神之间建立起新的理论连接，并逐步形成具有原创意义的“趣味伦理”取向，使“趣味”超越狭义审美范畴，发展为连接文学价值、公共文化与精神成长的伦理机制。由此，殷企平不仅拓展了文学批评的公共维度，也为现代性条件下如何重建文学与普通读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具有现实关怀与理论创造力的解释路径。

Works Cited

Arnold, Matthew.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 *Lectures and Essays in Criticism*, edited by R. H. Super and Thomas Marion Hoctor, Sister. Ann Arbor: U of Michigan P, 1962. 258-285.

—. “Heinrich Heine.” *Lectures and Essays in Criticism*, 1962. 107-132.

—. “West London.” *Victorian and Later English Poets*, edited by James Stephens, et al. New York: American Book Company, 1949. 566-567.

马修 • 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韩敏中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 年。

[—. *Culture and Anarch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Criticism*, translated by Han Minzho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Bradbury, Malcolm. “A Stern and Righteous Reader.” *New Statesman* 12 Feb. 1999: 52-53.

曹山柯等编：《卷三　文化观念生长时期的英国文学典籍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0年。

[Cao Shanke et al., eds. *The Idea of Culture in British Literature: Volume Three—Burgeoning*.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Education Press, 2020.]

Day, Gary, ed. *The British Critical Tradition: A Re-evaluation.*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3.

Eagleton, Terry.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Verso, 2005.

特里 •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

[Eagleton, Terry.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ranslated by Wang Fengzhen. Beijing: Peking UP, 2018.]

Eagleton, Terry. *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76.

高晓玲：“诗性真理：转型焦虑在 19 世纪英国文学中的表征”，《外国文学研究》4（2018）：47-57。

[Gao Xiaoling. “Poetic Truth as the Expression of Anxiety in the 19th-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4 (2018): 47-57.]

Jones, Tod E. “Matthew Arnold’s ‘Philistinism’ and Charles Kingsley.” *The Victorian Newsletter* Spring (1998): 2-3.

Johnson, Samuel. *“Life of Gray.” Lives of the English Poets* Vol. 3. New Haven: Yale UP, 1963. 449.

—. *Preface to Shakespeare. The Yal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Samuel Johnson* Vol. 7, edited by Arthur Sherbo. New Haven: Yale UP, 1968.

—. *The Rambler, No. 121, 14 May 1751, in The Yal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Samuel Johnson* Vol. 5, edited by W. J. Bate and Albrecht B. Strauss. New Haven: Yale UP, 1969. 336-342.

Kermode, Frank. *An Appetite for Poetry*. Cambridge: Harvard UP, 1989.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殷企平：《“文化辩护书”：19 世纪英国文化批评》。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年。

[Yin Qiping. *“An Apologia of Culture”: Cultural Criticism in the 19th Century Britai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Education Press, 2013.]

——：“普通读者”，《外国文学》6（2019）：44-54。

[—. “The Common Reader.” *Foreign Literature* 6 (2019): 44-54.]

殷企平：“趣味即文化：阿诺德对文学批评的贡献”，《外国文学研究》5（2021）：43-54。

[—. “Taste as Culture: Matthew Arnold’s Contribution to Literary Criticism.”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 (2021): 43-54.]

——：“走向公共精神：伊格尔顿的趣味观”，《外国文学》6（2022）：71-80。

[—. “Towards Public Spirit: Eagleton’s Views on Taste.” *Foreign Literature* 6 (2022): 71-80.]

张隆溪：《同工异曲：跨文化阅读的启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年。

[Zhang Longxi. *Similarities: The Enlightenment of Cross-Cultural Reading*.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2006.]

张琰、殷企平：“‘普通读者’与外国文学研究：殷企平教授访谈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3（2022）：14-23。

[Zhang Yan and Yin Qiping. “The Common Reader and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Yin Qiping.”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3 (2022): 14-23.]